

# 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sup>\*</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

**【摘要】** 文章根据抽样社会调查的结果,对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呈现出“中间阶层认同”相对缺乏的特点。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影响着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父辈社会地位、个人的“相对剥夺感”强度、个人客观社会地位及所处区域等。

**【关键词】** 城市人口 主观阶层认同 影响因素

## 一、城市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现状

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和分层机制变化时,大多数学者都着眼于对客观分层的研究和讨论。但社会分层研究的创始者们——如马克思和韦伯等从一开始就指出社会分层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现象,它与人们的主观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有了充分的觉悟后,才会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他在此强调的乃是一种主观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这种阶级意识概念的基础是强调不同社会群体间直接、尖锐的利益冲突的阶级分析理论(马克思,1972;米尔斯,1987)。与之相对应的,受韦伯多维社会分层思想影响的学者们则更愿意将与社会分层相联系的主观意识称为一种“阶层意识”(strata consciousness),即一种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阶层意识的基础不仅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差别,还可以建立在经济、权力、文化等各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基础之上(Jackman等,1973;刘欣,2001)。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观阶层认同(status identification)反映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Jackman等,1973:569),它构成了阶层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总体社会发展目标,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一个稳定的小康社会不仅表现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达到了较为丰裕的生活水平,同时还表现为社会中大多数成员都具备了“中间以上”的阶层意识或认同(渡边雅男,1998;李强,2000)。可见,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但目前国内有关公众阶层认同的研究尚不多见,已有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对某一城市的考察结果(刘欣,2001;郑晨,2001),在范围和深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扩展。本文将根据全国性社会调查<sup>①</sup>的结果,对当前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当前中国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基本状况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比例最高(占46.9%),其次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低层”的人(占26.5%),再次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

---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的阶段研究成果之一,王奋宇、王元在本文写作时提出过建设性建议,《中国人口科学》的匿名审稿人对本文初稿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文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概由执笔人负责。

① 文中数据除说明外,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10~11月在全国31个省份中对15000名城市居民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094份,有效回收率为74%。

的人(占14.6%),而自认为位于社会“中高层”(占10.4%)和“高层”(占1.6%)的人则相对较少<sup>①</sup>。

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在结构上有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作为社会结构稳定基础的“中间阶层”<sup>②</sup>,这使得现代社会的结构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变成了“橄榄型”(李培林,1995;李强,2000)。这种变化反映在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上,就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渡边雅男,1998)。如日本国际价值事务局于1979年对美国、法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3个国家的公众进行的阶层认同的调查表明,各国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的公众比例都在50%~70%之间<sup>③</sup>。如果说这些国家的数据与当前中国所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因相差较大而无法比较,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日本1965年的情况(当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1000美元,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比较接近)。根据日本总理府1965年进行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中关于阶层认同的调查结果,当时日本认为自己处于“中层”的公众比例达到了52.6%<sup>④</sup>。相比而言,本次调查中国城市公众中有“中层认同”的人口比例是比较低的。当然,由于抽样方法和范围不完全相同,本次调查的结果与其他国家的结果并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进行直接比较,但我们仍可大致推断,当前中国城市人口中存在着对“中间阶层认同”的相对缺乏。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学者们根据对各种客观指标的测量断言,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尚缺乏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sup>⑤</sup>(李强,2001;张宛丽,2001)。而本次研究的结果可能喻示着,这种“中间阶层”的缺乏不仅表现在客观经济社会指标的衡量结果上,也表现在人们“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上。

## 二、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因素: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在了解了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之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影响着人们主观阶层认同形成的因素有哪些?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影响人们主观阶层意识的因素很多,除了客观因素外,各种主观因素也有一定作用。尤其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决定阶层意识的因素和机制可能是更为复杂的。下面我们将首先根据既往研究的结果提出可能的研究问题和假设,然后根据调查数据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以求寻找出当前影响公众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

### (一) 关注的主要问题及研究变量

主观阶层认同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主观看法,而这种主观看法的形成,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所处的实际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也是以往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客观社会地位对主观阶层意识或阶级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研究者对于这种影响的强度大小则存在着不同看法(Cantril,1943;Hodge等,1968;Jackman等,1973)。因此,我们的研究中

- ① 我们在问卷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将您所在地人们的社会层分为七层,您认为您处于哪一层”。为比较研究方便,我们将问卷答案中的“最高层”和“高层”合并为“高层”,将“最低层”和“低层”合并为“低层”,形成一个五层的阶层认同结构。
- ② “中间阶层”亦称中产阶级、中产阶层,它一般是指在生活水平和财产地位上处于社会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同时,它也指一个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职业特征、自我感知等趋同及社会评价与认同一致的群体(李强,2001;李正东,2002)。研究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指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均处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中间水平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张宛丽,2001)。
- ③ 该调查的主观阶层认同结构与本调查相同,也分为“上层”、“中上”、“中等”、“中下”和“下层”(渡边雅男,1998:333~334)。
- ④ 该调查的主观阶层认同结构与本调查相同(参见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全国调查委员会,1985:44)。
- ⑤ 据肖文涛(2001:94)估算,如果将人均年收入在1万~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万~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标准的话,目前中国进入这一阶层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20%~25%之间,而李春玲(2004)以职业、收入和消费水平为标准衡量的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也分别只有15.9%、24.6%和35%。

首先将考察人们客观社会地位对主观阶层意识的影响,并把被调查者的月收入、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作为反映其客观分层地位的指标,将其引入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分析。

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情况,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的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一部分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在中国父亲职业地位对于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他们据此认为,中国在1949年后经历的巨大的社会转型大大削减了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Parish, 1984; Whyte, 1984; 陈婴婴, 1995)。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坚持认为父辈社会地位对下一代社会地位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先赋性因素对于子女的社会地位获得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阶层关系的再生产模式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有根本的改变(Lin 等, 1991; 李路路, 2002)。鉴于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引入反映被调查者父辈社会地位的变量,考察它对于个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这可以为考察中国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自马克思开始,学者们就已经注意到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的形成有可能受到社会变迁及个人生活际遇相对变化的影响。马克思曾形象地比喻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需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的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越发感到受压抑”<sup>①</sup>。个人生活境遇的恶化会影响到他们对社会公平的判断,使人们产生受到“相对剥夺”的感觉,而这些都可能对人们的阶级意识及其认同的形成造成直接影响。汤普森(2001)也指出,工人阶级的生活过程和斗争过程,就是阶级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生活境遇逐渐恶化的个人更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主观社会地位有更低的认同,而那些对社会不公程度感觉较高者也更可能将自己归入较低的社会阶层呢?为此,我们在研究中引入了被调查者对“近五年来生活状况变化”的判断以及他们对于当前整体的“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考察这两个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作用。

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是世界上地区发展不平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研究中国中间阶层的学者们也发现,中国中间阶层分布有一定的区域性,主要集中于沿边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肖文涛, 2001; 戴炳源等, 1998)。那么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分布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分析中引入了公众所在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公众对自己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形势的判断这两个变量,考察区域差别对于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除以上提到的变量外,为起到统计控制的作用,我们还在分析中引入了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等作为研究自变量。

## (二) 基本研究策略

我们的基本研究策略首先是“主观阶层认同”作为因变量,以可能影响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本研究中的“主观阶层认同”是一个定序变量,但为分析方便,我们可将其近似地作为一个定距变量来处理。同时,我们将自变量中的定序变量近似地作为定距变量,并将定类变量转换为虚拟变量。

## 三、统计分析结果

在表中,我们列出了以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模型总体检验显著( $P < 0.001$ )。从模型的决定系数  $R^2 = 0.445$  可看出,以我们提出的这些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 44.5% 的变差,模型的总体解释力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从显著度来看,我们设定的研究变量大部分都

<sup>①</sup>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表 各研究自变量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 自变量         | 回归系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自变量            | 回归系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
| 常数项         | 5.164*** | —       | 所在地区(参照项:东部地区) |           |         |
| 收入水平        | 0.001*** | 0.125   | 中部地区(是=1)      | 0.009     | 0.009   |
| 职业地位        | 0.086*** | 0.129   | 西部地区(是=1)      | -0.116*** | 0.057   |
| 本人教育程度      | 0.039*** | 0.042   | 年龄             | 0.019***  | 0.044   |
| 父辈的社会阶层     | 0.386*** | 0.458   | 性别(男性=1)       | 0.038*    | 0.021   |
| 近年来生活变化情况   | 0.150*** | 0.152   | 政治面貌(党员=1)     | 0.077**   | 0.034   |
| 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  | 0.085*** | 0.072   | 婚姻状态(已婚=1)     | 0.009     | 0.004   |
| 对地区社会经济形势判断 | 0.076*** | 0.065   | R <sup>2</sup> | 0.445     |         |
|             |          |         | F              | 397.425   |         |

\* P&lt;0.05, \*\*P&lt;0.01, \*\*\*P&lt;0.001。

对因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显著作用的变量只有“婚姻状态”和所在地区是否为“中部”。

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最大的自变量是“对父辈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认为父辈所处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可能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认同。“对近年来生活变化的判断”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仅次于“父辈社会地位”,越是那些认为近年来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人,就越有可能认为自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对于主观阶层认同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职业地位较高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更可能具有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的影响也比较重要,越是认为当前社会公平程度较高的人,就越可能认为自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

被调查者所在地区以及他们对于当地社会经济形势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主观阶层认同。首先,地区间的差异是明显存在的,相对于东部地区的人们而言,西部地区的人们更可能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但相对于中部地区的人们则没有明显表现出在自我阶层认同上的差异。其次,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个人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形势越好,越可能有较高的自我阶层认同。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我们发现年龄(年龄越大,主观阶层认同越高)、受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越高,主观阶层认同越高)、政治面貌(相对于非党员而言,党员对自己的阶层认同更高)、性别(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对自己的阶层认同更高)这几个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

#### 四、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

##### (一) 父辈社会地位对于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性:社会资源和地位的代际传递

在本研究中,我们考察了个人的主观阶层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父辈社会地位的影响,这实际上为我们透视中国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角度。从统计结果看,父辈社会地位对个人主观阶层认同的作用是我们设定的变量中最为显著的,说明个人对自己所处阶层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家庭出身的影响。如果使用美国社会学家布劳与邓肯(Blau 和 Duncan, 1967)对影响个人地位获得因素所做的“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区分<sup>①</sup>,我们可以发现,先赋性因素无疑是当前影响中国城市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阶层认同是一种主观意识,它不单是一种对于客观社会事实的简单反映,还包括有复杂的个人心理、文化因素,它的形成与个人

<sup>①</sup> 布劳与邓肯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可以区分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大类,前者主要指与个人出身背景有关的各种因素,如父辈社会地位等,后者主要指通过个人后天努力获得的个人特征,如个人所受教育等(Blau 和 Duncan, 1967)。



的成长经历、成长环境都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正如布迪厄(Bourdieu, 1986)所指出,在代际之间流动着的不仅仅是各种有形的物质资源(物质资本),还包括着各种无形的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与能力(文化资本),而这些无形资源对人们的主观意识(包括阶层认同)的形成无疑起着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我们或可进一步推论,较之对个人实际社会地位的影响而言,父辈社会地位等先赋性因素对个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可能是更为直接和显著的。

### (二) 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相对剥夺”命题:生活际遇的变化与社会公平感

刘欣(2001、2002)曾经提出过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命题,认为当人们与自己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成员相比正在沦入“相对剥夺地位”<sup>①</sup>时,将更倾向于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从而更可能认为社会是一个分层社会。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当人们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他们就更可能认为自己是处于一个较低的社会层面中,从而产生较低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一假设得到了本研究结果的证实。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那些认为自己近年来生活变得更差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社会不公程度较高的人们,更有可能将自己归入较低的社会阶层,也更不可能拥有“中层以上”的阶层认同。当人们认为自己近年来生活变得更差,说明他们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部分社会资源,而认为社会不公程度较高,则说明他们意识到他人拥有了一些自己无法得到的资源。而这些都意味着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相对剥夺地位”,极有可能产生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因此,这一部分人对自已的阶层认同偏低是不难理解的。

除了上述两个变量之外,是否处于“相对剥夺地位”还可以从本次研究中另外一些变量中得到反映,如受教育水平较低者较之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更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工人较之从事其他职业者更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低收入者较之高收入者更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另外,由于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人较之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人也更可能处于相对剥夺地位(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有关主观阶层认同的地区差异中进行详细的论述)。从本次研究的结果看,这些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的人确实更可能对自己所处的阶层有着更低的认同,同时更不可能有“中层以上”的阶层认同。这些也都证明了决定主观阶层认同的“相对剥夺”命题的有效性。

### (三)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着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一点在本研究中也得到反映,我们发现收入较高的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和职业地位较高的人都更可能拥有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也更可能认为自己属于“中间以上”社会阶层。日本学者直井道子曾根据日本阶层意识的经验研究结果指出,高收入和富裕的财产容易使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属于富裕的一类,从而导致中上的阶层归属意识(渡边雅男,1998:325)。看来,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意识匮乏的问题,一个最主要的途径仍是提高人民的整体收入和经济地位,这可能是有效地培育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的基本前提条件。

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曾一度出现过“脑体倒挂”的不正常现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逐渐得到体现,受教育水平高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也逐渐形成,这些因素都使有更高教育程度的人更可能拥有较高的自我阶层认同。

研究者在分析中国利益格局变动时,多以各职业群体的利益变动情况作为分析的起点。例如李强(2000)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变动时,就是根据不同职业群体从改革开放中的获益程度开展分析的<sup>②</sup>。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处于不同职业分层的人们在自我阶层认同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或许

① 刘欣(2002)认为,相对剥夺地位是指“某一个人或社会群体与同一社会的其他成员或群体相比较,所处的对有价值社会资源较少占有或不占有的状态”,它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客观前提。

② 李强(2000)根据各职业群体在改革中的受益程度将其划分为“特殊获益群体”(如高级管理人员、大企业家等)、“普通获益群体”(知识分子、一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包括失业、下岗职工等在市场转型的第二阶段出现经济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以及在改革中受益最少的“社会底层群体”(如贫困人口、农民工等)。

正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受益的程度有所不同,使得原本由于职业分层而导致的阶层认同差异被进一步强化和固定化了。特别是当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无法从改革中获益时,将有可能形成比较明确的底层阶层或阶级意识。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善,有可能使社会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代表客观社会分层地位的变量对主观阶层意识有显著的影响,但它们却并非影响最大的自变量。甚至在考察收入、教育和职业与主观阶层认同的相关关系时,我们还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强烈<sup>①</sup>。也就是说,人们的客观社会地位对主观阶层意识的作用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明显,二者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不一致性。以往研究者将这种不一致性归因于社会结构的多元性。由于在多元社会中,划分社会集团和阶层的标准也是多元的,某一个人可能同时处于多个相互重叠的社会集团之中,这样个人就不容易形成对某一群体的特定认同(Hodge等,1968;Jackman等,1973)。我们认为,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人们客观地位与主观阶层意识的不一致,还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变化有关。这些变化主要包括:第一,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个体主义化”趋向;第二,社会阶层流动的加快带来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第三,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焦点问题的改变使观念和意识形态“碎片化”趋势加剧。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当前的转型期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定化和碎片化趋势似乎在同步发生,这就使本来就很复杂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分层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难解。

#### (四) 主观阶层认同的地区差异:参照群体还是相对剥夺

地区差异对人们的阶层认同的影响是我们关注的研究问题之一,那么这种影响机制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按照上述“相对剥夺”地位可能导致主观阶层认同偏低的命题,我们可以假设处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会有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从而更有可能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学中“参照群体”理论认为,人们一般是根据某个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群体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或社会行为的(Merton,1957)。具体到阶层认同问题上,这可能导致人们对自我社会阶层的评价与他人评价不同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参照群体可能是周边生活水平较差的人,从而提高了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估(李强,2000:182)。比如一个月收入为1000元的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其收入水平也许只算是中等偏下,但在西部地区可能已经算上等水平了。这样我们似乎又可以推论当各种客观指标得到控制后,处于中西部地区者的自我阶层认同未必会低于处于东部地区者。那么这两种假设哪一个更接近于现实情况呢?

从本研究的统计结果看,在控制了收入、教育等指标后,处于相对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人、以及对自己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形势评价较差的人,都更可能对自己的阶层地位有较低的认同。这似乎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剥夺”命题的解释力要比“参照群体”的解释力更强一些。也就是说,那些处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会产生更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认同较低。

那么,为什么“参照群体”理论在这里失去了解释力?以往研究者认为,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时,更倾向于选择自己周边的人或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作为参照的对象(李强,2000;李培林,1995)。但随着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开始呈现出“断裂”特征,这有可能导致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时,已不再限于自己周边的社会群体,而可能根据通过各种信息了解到的理想社会群体及生活方式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尽管我们在提问时强调了“您认为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分层中属于哪一层”,但回答者却仍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地”二字,而直接根据自己对整体社会分层的想象来为自己定位。这种信息时代里新技术发展对于人们主观阶层意识形成所造成的影响,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本文集中对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进行了描述和讨论,并就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与建议。但由于研究数据和篇幅的限制,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

<sup>①</sup> 在此次调查中收入、职业和教育与阶层认同的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12、0.09 和 0.08。

未被纳入考察范围,例如:人们对于社会阶层的主观认知情况(即对中国是不是一个分层社会的判断)、人们对社会分层标准的主观看法、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与财产占有、社会交往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另外,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关于中国公众阶层认同的分析都仅局限于对城市居民的讨论,而没有包括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的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而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都可以成为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索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 陈婴婴(1995):《职业结构与职业流动》,东方出版社。
2. 戴炳源、王安培(1998):《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特点及发展态势简析》,《财政研究》,第9期。
3. 渡边雅男(1998):《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定化》,陆泽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4. [日]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全国调查委员会(1985):《1985年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全国调查报告》,《阶层意识的动态》,第二卷。
5. 李春玲(2004):《中产阶级:中国社会值得关注的人群》,载于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李路路(2002):《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层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7. 李培林主编(1995):《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8. 李培林(1995):《中国乡村里的都市工业》,《社会学研究》,第1期。
9. 李强(2000):《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
10. 李强(2001):《关于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11. 李正东(2002):《论中国中产阶层的现代化功能》,《南京社会科学》,第10期。
12. 刘欣(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13. 刘欣(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14. 马克思(1972):《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5. 米尔斯(1987):《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6. 汤普森(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17. 肖文涛(2001):《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第3期。
18. 张宛丽(2001):《中国中间阶层研究报告》,载于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 郑晨(2001):《阶层归属意识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广州市居民的一项调查》,《浙江学刊》,第3期。
20. Blau, Peter & Ducuan, Otis(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ley.
21. Bourdieu, Piereer(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pp.241-258.
22. Cantril, Hadley(1943), *Identification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Clas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38: 74-80.
23. Hodge, Robert & Donald J. Treiman(1968),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3: 535-547.
24. Jackman, Mary R. & Robert Jackman(197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8: 569-582.
25. Lin, Nan & Yanjie, Bian(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7: 657-688.
26. Merton, Robert(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27. Parish, William(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84-120.
28. Whyte, M.(1984), *Sexual Inequality under Socialism.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98-238.

(执 笔: 赵延东)

(责任编辑: 朱 犁)

**ABSTRACT****Family and Changes of Living Arrangement of the Elderly in China***Zeng Yi Wang Zhenglian · 2 ·*

The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sampling data of the Chinese 1982, 1990 and 2000 censuses. The percentage of three-generation households in 2000 increased considerably compared with 1990 and 1982. The proportion of two-generation core families in 2000 dropped by about 17 percent compared with that in 1990. However, this change does not mean that Chinese families are drawing back to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This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lagging effect of low fertility rate since the 1970s. Most old parents still lived with a married child (although declining). The young generation seldom lived separately with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married due to less brothers or sisters. In fact, the Chinese family is turning to a modern style.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Zhu Nong Zeng Zhaojun · 9 ·*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ies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in the 1990s.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ve a trend of convergence, the larger the size of a city, the lower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2) The inertia of migration encourages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3) The opening-up policy significantly favors urban development, and such effec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relatively backward inland areas; (4)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peed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The Current Stratum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Determinants***Research Team, CASS · 19 ·*

Based on a sampled survey,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subjective stratum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determinants. We find that there lacks identification on middle strata among urban resident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tratum identification include the parent's social status, the feeling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the area where people lived.

**The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Tang Jun · 26 ·*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the urban population, which is being changed from "unit-based" to "community-based". Then, the paper reviews the policy changes from community services to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Finally, it discusse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based on the role that the community services are supposed to lay in the community building.

**The Impact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Du Yang · 33 ·*

Using provincial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economic growth. Similar to other cross-country studies, this paper indicates the dynamic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ctors on economic growth. The negative impact of birth rate on economic growth is being impair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labor increase on economic growth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ing the economic growth,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population policy timely.